

人民公仆李锡铭

○李 湜



李锡铭学长

求学之路

1926年阴历正月十六，父亲出生在河北省束鹿县城里的一个富裕的家庭，七岁开始在镇上的小学读书。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打响，不久老家沦陷。父亲跟着奶奶到北京逃难，和在京做生意的爷爷团聚。父亲先后在北京志诚中学和育英中学读书。当时北京城被日本鬼子占领，学校实行奴化教育，父亲对日本教师极为反感，不甘心做亡国奴。

1943年，父亲和他二哥一起冒着战争的烽烟，冲破重重封锁线，历经几个月的徒步行走，千辛万苦来到当时的“国统区”。因为战乱，和家里失去了联系。父亲的二哥报考了远征军，到印度美军联络官组当翻译，当时得到一笔安置费交给父亲，才使得父亲在四川合川国立二中继续完成学业。年仅17岁的父亲经历了一段非常困苦的学习生活，他不怕吃苦，追求光明，小小年纪就有了忧国忧民、立志报国的情怀。在他留存下来的诗稿中，可见一斑。

“蜀天千里，重峦外，云海苍茫遐处。默默嘉陵千古事，苦难重重谁诉。叱咤风云，豪杰喋血，滚滚江水赤。蒙哥何存，巍峨鱼城如故。

遥想故国燕云，狼烟鼙鼓，寇骑长驱入，几代权奸轻社稷，俯首甘为奴

每每想起父亲，心里便涌动着深深的崇敬和隐隐的心疼。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温暖慈祥，他对我们的爱总是在默默的关注中。没有说教，没有指责，总是用实际行动引领和教育着我们。他善良厚道的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无形地贯穿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不太爱讲话，沉静、稳健、内敛、持重，却能让人体会到感人至深的“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

在那些发黄的旧照片里，我们看到学生时代的父亲，马裤、长靴、白衬衫，一脸的桀骜不驯，满身的激情热血。他是经历了怎样的苦难、磨砺；承受了多重的使命、责任；从一个翩翩学子，成长为一个坚忍不拔的共产党人。

□ 解放战争时期校友足迹

虏。曼舞轻歌荒淫无度，甘做儿皇帝。为国干城，自有英雄人物。”（《念奴娇·鱼城怀古》，1944年春于四川合川国立二中）

他用“曼舞轻歌荒淫无度”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失望；用“自有英雄人物”来表达自己为国担当的气概。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父亲高中毕业，从四川来到上海。1946年在上海他考入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回到北京。

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父亲参加了学生进步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1946年12月24日，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父亲和几千名学生参加了抗议游行。父亲是游行纠察队的队员，他举着一面旗帜，走在队伍的前面。这次游行唤起了学生们政治上的崛起，随即父亲又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

父亲的表现得到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同宿舍的中共党员刘毅立向他讲述了党的主张，给他地下党的秘密刊物，父亲如饥似渴地阅读，从而更加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活动。1948年3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清华大学宿舍“善斋”楼顶上，入党介绍人刘毅立同志带着他举起了右手，对着漆黑的星空，庄严地、轻声向党宣誓。

刘义立同志回忆说：年轻时的锡铭很有正义感，对黑暗的东西嫉恶如仇，政治上很成熟。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他很聪明，多才多艺，他的画画得很棒，而且他很正直，话不多，却很有分量。锡铭入党后，很快成为了骨干，做了支部的委员。

从入党的那天起，父亲便为了自己的信仰努力奋斗着，从不懈怠，从不退却，从不低头，义无反顾，执着而坚定。



李锡铭，清华大学读书时的
时年二十一岁

脱胎换骨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接收和管理北平城需要大量的干部，党组织从北平地下党大学部抽调了一批在校的学生党员骨干，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党组织派遣父亲到石景山发电厂从事建团工作并兼任厂党总支宣传委员，先后担任了厂总支副书记、党委书记。从22岁到49岁，一干就是26年。

解放前，石景山发电厂只有5.5万千瓦的发电容量，设备残破不堪，可是北平用电全靠它。当时的中国是多么的贫穷落后，困难重重。父亲是个出生在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他面临着严峻考验。

父亲没日没夜地和工人们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永定河畔建成了十几个电站。石景山老厂被人工爆破，改建为大型热电厂，既供电又供热，发电容量从5.5万千瓦增加到150多万千瓦。

父亲作为石景山发电厂的党委书记，带领着一支勇于拼搏的工人队伍。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里，有父亲的脚步；国家经济快速前行的辉煌里，有父亲的奉献。

那时我们都还小，只记得父亲整日地忙碌。他穿着一身工作服，和工友们一起摸爬滚打，一起锻炼成长。



工农化的典型代表
一个知识分子

建设高井电站时，没日没夜地加班，抢工期，干部、工人、家属一起上工地。扛洋灰，别人一次扛一袋，他一次扛两袋。有一次累得吐了血，也不吱声。父亲工作起来不要命，工人们叫他“拼命三郎”。

1955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粮食定量，管理人员一个月定量32斤，那时候没有油水，吃不饱，父亲还常常把粮票和钱送给家里孩子多、干体力活的工人。父亲和几位党委委员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拿出10元钱，放在一个纸盒子里，积少成多，补助给有困难的职工。

1960年，饥荒严重，党号召公职人员减口粮，其他人减到30斤或28斤，父亲自己减到了25斤，定量是全厂最少的一个。我们都饿得面黄肌瘦，为了填饱肚子，记得我和小伙伴爬到树尖儿上摘榆钱儿充饥，树枝断了，我从树上掉下来，摔晕了，几个工人把我抬回了家。

父亲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工人特别的宽厚，从小我们就效仿着他谦逊和善地做人，福利面前不伸手，工作之中挑重担。

工人们回忆说：刚进厂时的锡铭，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洋学生，厂里的年轻人都跟在他身后转。他教工人们识字、学文

化，带着工人读书，恨不得把自己全部知识都传授给工人。抗美援朝时，他给工人们做报告，只写一个提纲，一讲就是2小时。每次报告后，工人们都围在他身边，问这问那，久久不肯离去。由于他工作起来勤奋得像头牛，年轻人都亲切地叫他“牛哥”。石电的工人们都不叫他李书记，而叫他李师傅。直到他身居高位，石电人遇见他，仍叫他李师傅。这种亲情已融入在石电人和父亲的血脉中。

一个知识分子在基层经历了26年的磨练，完成了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蜕变。

厚德载物

1975年春天，父亲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他到水利电力部任副部长。他拿到工作调动函，乘坐厂里的破旧吉普车，到中央组织部报到。传达室的工作人员，看到他穿着一身工作服的装束，以为他是送信的，说：“你把信放下，回吧。”父亲说“我是来报到的”，传达室工作人员惊讶地打量着这个“油脂麻花”的副部长。父亲的朴实憨厚、低调平素，始终贯穿在他的生命中。

父亲到水电部不久，就赶上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受组织委派，父亲当天就带领水利电力部工作队赶赴灾区，战斗在抢修陡河电厂第一线。不顾自己的安危，不顾余震的影响，冒着酷暑，在现场指挥抢险。在一片狼藉的废墟中拼命地挖救伤员，双手手指伤痕累累，几天几夜不离开现场。灾区环境恶劣，尸骨遍野，断水、断电、没有食物。父亲耗尽了所有的体力和情感，钱正英部长考虑到他的体力不支，调他回家休息。当他回到家里时，已经不成样子了，在他疲惫不堪的脸上刻着

□ 解放战争时期校友足迹

无限的悲伤，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妈妈心疼得掉下了眼泪。父亲在家里只睡了一天一夜，体力还没恢复，就又返回唐山，投入到抢修陡河电厂的战斗中。

那时妈妈在石景山发电厂工作，别人家盖防震棚都有男人干，我家只有妈妈和我俩人，多亏了邻居帮忙，我们家和邻居赵叔家盖了一个防震棚，两家住在一起，相互有个照顾。我们习惯了家里没有爸爸的日子，妈妈含辛茹苦带大我们兄妹三个。可妈妈从没有埋怨过，默默地支持着父亲。

1977年初，父亲接到余秋里副总理的通知，要马上赶赴沈阳，领导恢复东北电网的重要工作。

“文革”后的东北三省，这个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区，陷于一片瘫痪。电网周波只有44.7，已将瓦解。余秋里副总理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东北电网恢复到50周波。如果完不成任务，你就跳鸭绿江，不要回来了。”父亲率领着全国各地抽调的120名技术骨干组成的工作团，带着党赋予的重任，来到辽宁清河电厂，一干就是两年没回家。他吃住在现场，大半年的时间蹲在点上，挖掘潜力，扩大容量，提高发电能力。

当时的东北三省派系争斗十分厉害，人心涣散，恶势力猖獗，恢复电网工作屡遭重创。父亲把所有的干部都派到第一线去抓点，解决问题。后来中央决定成立东北电网领导小组，由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担任组长，父亲为副组长，共同携手完成了恢复东北电网的工作，从而他们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正是这年，由于东北的气候原因和父亲超负荷的工作，他患上了严重的鼻窦炎，以至于几年后不得不在北京医院做了

手术。记得父亲手术时我一直陪着李德生同志在手术室外等候。他风趣地说，锡铭的病是因为帮助我们东北人民用电才得的，他手术，我代表东北人民陪伴他。

正是由于父亲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难，勇于担当的精神，使他在电力系统威望极高，有“消防队长”之称。

务实进取

记得2003年我陪父亲去上海看病，途经苏州，我着实爱上了小桥流水，前街后河。当地接待我们的一位同志说：“漂亮吧？这都得感谢你父亲呐。现在的园林建筑和小桥流水能够保留得这样完整协调，多亏了当年李部长的决策。”1982年有些地方官员要把围绕园林建筑的河道填平，修成宽阔的马路。时任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的父亲立刻组织考察组，带着建筑学、规划学的专家，来到苏州，实地考察。经过研讨规划，申请将苏州城北划拨一块地，扩大了原市区的规划。最终保留住苏州园林建筑群的原貌，保住了这座有特色的江南老城。

父亲一直是个追求进步、接纳新思想新事物的开明之人，有独立的思考，有开阔的眼界，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是个坚定的改革派。他做事稳健，实事求是，讲究科学，绝不冒进，绝不胡来。父亲身上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在改革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

心系百姓

关乎民生的每一件事，在父亲那里都是大事，他来自基层，能够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

80年代初，上山下乡的“知青”返京，北京城一下子“冒”出了40多万待业青年，社会压力非常大。作为一名普通街道干部的尹盛喜，接受了带领二十几名待业青年谋生路的任务，他们办起了“大碗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茶水摊把尹盛喜推上了时代的潮头。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人还不能接受这种自谋生路的经营方式，各种阻力接踵而来。要求处置尹盛喜，撤销茶社的人不少。

父亲来到北京市后，很快走访了“大碗茶”，询问待业青年安置情况，茶水摊的经营发展，对尹盛喜的工作坚决支持。对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为全国“知青”返城的安置工作提供了好的经验。父亲成了“大碗茶”的座上客，也成了尹盛喜的好朋友。我还记得尹盛喜来家里时和父亲促膝谈心的情景。

利康搬家公司是北京市住总集团的三产，是父亲极力支持和扶持的第一家为市民服务的企业。父亲常常到利康蹲点儿，为他们出谋划策，解决实际问题。后来又办起了利康烤鸭店，为当时发展多种经营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为解决学生们中午吃饭的问题，父亲支持个体小饭馆，办起了“小板凳”“小饭桌”。父亲多次来到小胡同里，实地考察个体饭馆，经营、卫生、安全等问题，鼓励他们承接孩子们的午饭，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为发展个体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记得茶食胡同小学、北京开关厂，都是父亲的联系单位，他常常去学校和孩子们一起活动，和老师探讨有关教育改革的问题。去厂里和工人们一起工作，解决企

业在改革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去北京齿轮厂慰问老干部时，在职工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饭时的情景。他手里拿着个大火烧，和工人们挤在一张饭桌上，边吃、边聊、边笑。

父亲对改革的倾心投入和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使他成为很多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知己。他是北京开关厂的荣誉职工，是留民营村的村民，是大碗茶青年服务社的座上客，是利康搬家公司的好参谋，是民营高科技企业四通集团公司、京海集团公司的支持者，是首钢人的朋友。

这是个伟大的时代，每个中国人都参与到改革开放中来，体会着从精神到生活的复苏和解放。父亲走在改革队伍的最前列，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里有他的无私奉献和无限深情；北京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凝结了他的心血。

扶持民企

中关村科技企业刚起步时，得到了时任市委书记的父亲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庇护，才有了今天“中国硅谷”的兴旺。

北京市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京海），当时创业无比艰辛，遇到各方的阻力。总经理王洪德说：时任市委书记的李锡铭，给予京海公司特别的关注和支持，前后四次来到京海公司调研。他第一次来京海时就高兴地说“干得好，京海的路很宽，要坚持走下去”。他还亲自为京海公司题词“开拓前进”。

1989年春夏之交，四通公司卷入了政治风波，中央要求北京市代表中央派出一个小组清查四通公司的问题。当时四通公司总裁、副总裁等人已纷纷出逃，四通公司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四通人整天都在

□ 解放战争时期校友足迹

惶恐不安中度过。

1989年6月19日，市委检查组进入四通，经过两个月的清理调查，终于到了决定四通命运的时刻。

在张福森同志主编的《中关村纪实》一书中记述到：8月21日，在市委书记李锡铭的办公室，检查小组汇报四通公司的清查情况。从下午2点开始，经历了3个半小时的会议。四通的干部们都没有下班，焦灼地在公司会议室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市委书记李锡铭边听汇报边提问题，最后他一脸凝重地说：“出现的问题解决了，企业是应该办下去的。有些人认为四通出了些问题，就要否定四通，否定试验区，我们要公开宣传，四通不但要办，还要比万润南在时办得更好。”他的决策不但在当时挽救了四通，而且也对日后四通以及其他中关村民办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路上父亲与民众的携手同行，使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父亲退休了，京海公司总经理王洪德、四通公司总经理段永基等人还来家里看望父亲。谈起他们共同经历过的奋斗岁月，不禁感慨万分。

父亲一向做事稳健，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却也难免有人把他的稳健攻击为“保守”，把他的坚守原则编造成“极左”。改革的进程中，不仅仅只有意识层面、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的创新，还有政治因素的较量，人际关系的抗衡，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

从父亲的诗词中，能感受到父亲举步维艰、心力交瘁的

疲惫，迷惘困惑的无奈：

“寒夜风声紧，窗含斜月残。沉思灯下心寂然，涉事深繁更知事理难。从未黄梁梦，不曾图安闲。自知愚钝悔当年，应是薛萝林下早让贤。”（《南歌子·寒夜风声紧》，1986年）站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线，父亲的压力太大了。有时他忙得几天几夜不睡觉，脚肿得连拖鞋都穿不上，每天忙到深夜，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也是个有血有肉人，也有无法承受重压的瞬间。

在北京市工作的八年，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八年。他有过太多的迷惘、困惑，遇到过太多的阻力、障碍。父亲累垮了，人瘦了很多。本来就不太爱说话的他，变得更加沉默。看着他疲惫的样子，家里人非常非常地心疼。如果有来生，希望他会选择更简单的生活，也许他会是个画家，也许他会是个诗人吧。

老骥伏枥

1993年，父亲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主抓法制建



李锡铭和农民们在地头

设。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年近70岁的父亲拖着带病的身体，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五年里，父亲到过广西的巴马，贵州的毕节，甘肃的甘南等老、少、边、穷地区，体察群众的生活；到过人烟罕至的黄河第一坝龙羊峡水库，慰问水电职工；到过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国家级高科技产业开发区，了解最新成果。到工厂、机关、学校、科研院所，到田间地头，祖国大地25个省市的183个地市（县）留下了他的足迹。

5年里，父亲召开座谈会、参加各种研讨会197个，考察农业、企事业单位723个。在去农村的路上，他停下车来，同放学路过的小学生席地交谈，了解青少年法的落实情况；在工厂矿山，他握住工人油乎乎的手，询问劳动法的执行情况。为了唤起民众的法律意识，他不停地奔跑着，为建立中国的法律制度辛勤地工作着。

1998年，父亲结束了人大的工作，终于退休回家，安享晚年。

淳朴家风

从小我们就习惯了父亲的忙碌，很少在家的他，爱我们，尊重我们。在他点点滴滴的行为中，我们体会着他的品德，效仿着他的为人。他潜移默化地传承着李家的家风：老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工作，淡泊功名利禄，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追求奢华，不弄虚作假，不溜须拍马，不趋炎附势，做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实事求是的老实人。

父亲去世后，我们照顾妈妈的生活，妈妈的退休金很低，生活难免有些拮据。她的退休金只有4000元，刚好够雇一个保



年青时的李锡铭夫妇

姆。我查看过她的工资条，1980年退休时是60元，2016年才涨到4000元。

1952年妈妈到石景山发电厂办公室工作，后来几次涨工资时，担任厂党委书记的父亲就会把妈妈的名字划去，把涨工资的机会让给别人，就这样，妈妈成了全厂干部工资最低的一个。

妈妈退休后，有关部门曾经询问核实过妈妈的退休和工资情况：妈妈是1949年10月在老家加入共青团，1951年在小学当老师，1952年到石景山发电厂工作。当时把退休转成离休，也不是不可以。妈妈坚决不同意，说自己参加工作的年限不够，不能算离休。

2000年8月，工作人员刘占国受父亲委托到南长街派出所，要求把李锡铭户口本上大学毕业改成大学肄业。当时负责管理户口的民警非常惊讶，刘占国对他讲了父亲的故事：李锡铭在毕业考试前，受党调遣去执行任务，没能赶上毕业考试。当

□ 解放战争时期校友足迹

时有一批学生党员，在外执行任务，都没能参加考试。组织上决定这批学生党员都算大学毕业，所以父亲的履历上是清华大学毕业。可是他觉得不妥，所以在发电厂工作时他就把履历上的大学毕业改成大学毕业肄业。

父亲到领导岗位后，组织上又把他履历上的肄业改成毕业。退休后，他还是坚持把学历按实事求是的事实改了过来。

这件事让民警同志感叹不已。

老老实实做人的家风，传给了我们兄妹三人。尤其是哥哥，不仅容貌酷似父亲，他还秉承了父亲的沉稳、正派、厚

德。他的敦厚在外人眼里近乎于愚钝，他干净的心灵屏蔽了尘世的污浊，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简单生活。退休在家的哥哥，读书、看球、伺候老妈，清心寡欲，无欲无求。三个孙辈都在平凡的岗位上认真踏实地工作着，低调、谦虚、不张扬、守规矩。李家的家风在父亲潜移默化的行为中得到了传承。

简单的日子里更能品味出浓浓的亲情，朴素的生活中延续着最本真的家风。父亲永远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陪着我们一路前行。

2018年4月

（上接第81页）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个带有一般民主主义色彩的组织名称已不能满足先进青年的要求了。事实上，早在1948年春，平津学委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就建立了与“民青”平行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所以，青工组一成立，就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武汉总支部章程》，在《章程》的“总则”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本联盟为一切新民主主义先进青年的骨干性组织……。在现今人民民主革命中，它愿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并要求盟员必须具备：服务人民的观点，集体主义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虚心学习的态度。这个章程经市委批准后，就据此发展成员。原来发展的“民青”成员均转为“新青联”盟员。

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职业青年中，青工组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建设者联盟（“新建联”），主要是用这个名称发展

秘密外围组织。也沿用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工委）创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者协会（“新建协”），发展过少数年龄较大的成员。在教师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新教研”），主要通过刘慕向在一些中学和个别大学发展了30多名会员。

截至武汉解放，青工组系统（不含外地）共有党员63人，“新青联”和其他外围组织成员500人左右。在市委的领导下，这支分布在60多个单位的队伍，与市委其他下属组织以及中原局、江汉区党委城工部系统的力量默契配合，为保卫城市，迎接解放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本文节选自《武汉风云——武汉党史资料汇编之三》（中共武汉市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1989年）中同名文章，由于篇幅所限，第五、六部分略去。小标题分别为：几个主要方面的组织和工作情况；联防应变，迎接解放。】